

口述

我在山大求学的日子

□ 闫西龄

1964年6月,我从在平一中高中毕业,考入山东大学化学系。开学时,我带上必备的学习、生活用品,独自一人先坐长途汽车经高唐到禹城,再转火车到达济南。刚出济南站即看到“山东大学新生接待站”大幅标语。接待新生的人员多为往届学生,也有老师。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接待站的汽车到达山大。



本文作者(2014年摄于山东大学)

当年山大概况

那时的山大分新校和老校两个校区。老校即目前的洪家楼校区,新校即目前的山大中心校区。洪家楼校区原是山东农学院。1958年山东农学院迁到泰安,校舍便由从青岛迁至济南的山大占用。因容纳不下所有师生,山大便另建了新校舍,称为新校。

那时,山大共9个系,即中文、历史、政治、外文、数学、物理、无线电电子(简称电子)、化学、生物。在9个系中,除政治系(分政治、哲学、经济学三个专业)学制四年外,其余均五年学制。

那年学校录取新生800多人,全校学生总数3800余人。其中,化学系共招新生105人,分为3个班。

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是颇有名气的革命家、教育家成仿吾。成校长早年和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人创办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。他是早期的共产党员,还是《共产党宣言》德文版的翻译者。抗日战争时期他是陕北公学的校长。成校长掌握德、日、英、俄、法5国语言,是曾经参加长征的唯一一位教授。我们入校不几天,他便给我们作了回忆长征的革命传统报告。

那时,山大的学生宿舍没有暖气,但教学楼、实验室、图书馆等均有暖气。

我们学生的口粮(成品粮)是每月15公斤。伙食费每月14元(当时猪肉1元/公斤)。那时规定,凡家庭收入人均超过15元者不享受助学金。我班(35人)有5位同学不享受助学金,全部自费上学,其余同学都有多少不等的助学金,助学金最高者是每月18元。我的助学金是每月15元,除支付每月14元的伙食费外,还有1元的零花钱。在那个粮食不能放开供应、国人温饱没有解决的年代,这让我深感大学生活好得很。

爬黑板

在课堂上,学生大都怕老师突然提问,更怕爬黑板。“爬黑板”是老师让学生到黑板上书写回答问题的俗称。

我们的课程都是全年级同学一起上。上第一堂俄语课时,老师走上讲台,首先自我介绍:“我叫马维庚,给同学们上俄语课。”然后又说:“你们是从不同高中上来的,我了解了解情况。”他拿出3张纸条,念了各纸条上写的问题,接着说,“让3位同学到黑板上书写回答。”

顿时,整个教室安静异常,人人紧张起来。我干脆低下头期盼别叫着我。正当我庆幸前两个名字不是我时,刹那间,只听第三个名字正是我。我硬着头皮走上讲台,用粉笔书写答案。好在,问题都答上了。我刚要转身走,这位老师叫着我的名字说:“你高考俄语成绩是85分,正好是你高考各科成绩的平均分。”这位老师的意思好像是说,叫你上来回答问题是因为你有代表性。

那时的高考,只公布考生录取于何高校,不公布成绩。高考分数被国家定为“绝密资料”。一直到1978年3月8日,邓小平指示“要公布高考成绩,这是堵后门的最好方法”。这样,从1978年高考起才开始公布考生高考成绩。



作者(前排左二)在山大上学时与同学合影

我们那年高考理工科的考试科目是: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,满分各100分,总分满分为600分。这位老师说我的高考总分是510分。

从和同学们的交谈中知道,马老师参加了我们那年高考的阅卷工作,也参与了学校的录取工作。

治疗“鸡眼”

高中毕业时,我就发现右脚一侧鼓起了个小包,小包呈圆形,硬硬的,表面光滑,稍微一碰疼得厉害。由于不是长在脚底板上,并不影响走路,所以一直没管它。进入大学一个月后,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校卫生室。接待我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。她很干脆地告诉我:“‘鸡眼’能治疗。”我便说,等改天我换了鞋袜(含洗脚之意)后再来吧。她一把抓住我微笑着说:“不用,脱鞋袜!我看看!”顺手把我按到椅子上。她俯下身,还没等我行动,便快捷地脱掉我的鞋袜,说:“‘鸡眼’长得这么大了!”接着便开始治疗:先在一块胶布上挖一个小圆洞,然后将胶布粘到“鸡眼”上,使胶布的小圆洞正好显露出“鸡眼”的核心部位,然后在“鸡眼”的核心部位涂抹上药膏(记得是她当场调配的),再用纱布、胶布包裹牢靠,最后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好啦!晚上也不要脱袜子,一周后再来。”我谢过离开。

第二天却被通知全年级到乡下劳动一周,因不影响干活,我也没说出正在治疗“鸡眼”这事。

返校的第二天我便到医务室,正好见到了那位医生。我很难为情地实话实说:“不但没有脱袜,也不能洗脚,还赶到乡下劳动一周,还有法治吗?”她仍然很亲切地微笑着说:“没关系,坐下,能治疗。”她俯下身子说了句“会有点疼,忍着点!”我说:“没关系,我不怕,您大胆治吧!”她花较长时间,用专门的镊子、药棉等物品,将“鸡眼”核心位置被腐蚀的烂肉全部挖出,逐渐露出一根像针头一样的黑色骨刺,然后将骨刺用镊子拔出,并举着让我观看。再用消毒药棉、胶布将伤口包裹后,她站起来说:“好啦!穿上鞋袜吧,五六天就能长好。”

果然,“鸡眼”一周后痊愈了,完全和没长“鸡眼”前一样,也没留疤痕。这“鸡眼”至今也没复发。

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,我下课回宿舍的路上忽然遇上这位医生,还没等我开口,她便说:“可爱的小同学,

‘鸡眼’好了吗?”我赶忙回答:“完全好了!真是太感谢您了医生,我再也不受‘鸡眼’的折磨了!”后来我们由老校搬到了新校,再也没见过这位可亲可敬的医生。

事情虽然已过去了近六十年,但我仍怀着崇敬的心情如实写出治疗“鸡眼”这事,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位敬业而可亲的医生,她的爱心使我真切感受到母亲般的亲切和温暖。我会永远祝福她。

在校广播站工作

1965年秋开学不久,我被选拔到新校广播站工作。广播站分为三个组:编辑组、播音组、机务组。我是机务组成员。机务室是个大房间,有广播用的各种器材和维修工具。如扩音机、录音机、电唱机、唱片、录音带等等。其中扩音机两米多高,据说和县城广播站用的相当。

在老师指导下,我当场学会了各项操作,并开始值班。每周值班两天,完全在课余时间。广播站各档次的的时间和播放内容,都是学校严格规定好的,必须按规定时间播放,也不能让噪声、杂音放出。主要播放时间和内容大致是:早上起床后播放广播体操及周一歌;三顿饭时间播放各系送选的稿件或学校的重要决定及周一歌;课外活动时播放歌曲、戏曲(由机务员从众多唱片中选取)或学生的稿件;晚七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,这个节目是全国各级电台、广播站必须转播的内容,相当于目前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。

广播站内容的播放大都只由一位机务员操作完成。播音员播放的稿件大多数是事先录制好的。播音员常约我给他们录制播音,因为他们感觉我能在他们播错时把纠错、重录等工作做得天衣无缝。

通过在广播站工作,我不但熟练掌握有关广播的各项知识和技能,也掌握了有关电的使用知识和安装技能。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很有益。特别是1971年底,我被分配到聊城地区师范学校后,兼职学校宣传工作,面对校广播站机器三天两头出毛病、大喇叭烧坏等情况,我手到病除,维护其正常运转,并选拔学生组建起编辑、广播和机务三个组,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,深受学校领导及师生好评。

(本版图片由闫西龄提供)